

反思文学批评弊端 建构批评家主体性

——第八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综述

◎ 史习斌

2018年12月16日,第八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广东湛江岭南师范学院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岭南师范学院、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和《文艺争鸣》杂志社联合主办,《语言与文化论坛》编辑部、《文艺论坛》编辑部协办,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澳门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云南昭通学院、闽南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肇庆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岭南师范学院等高校以及《文艺论坛》《语言与文化论坛》、中国诗歌流派网等文艺媒体的30多位知名专家、青年学者和诗人出席论坛,岭南师范学院副校长苏古发为论坛致开幕词,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赵金钟教授主持开幕式。在开幕式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主要发起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介绍了创办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宗旨与目标,并强调了论坛的明确定位与几大特点:新锐性、高端性、学术性(学理性)、开放性、包容性、建设性。随后,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近年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时代脉搏、改善批评和学术格局所做的努力,对论坛产生的学术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他对以赵金钟教授、张德明教授为首的岭南师范学院批评家团队给予了充分肯定,对这个团队新近出版的五卷本“岭南批评文丛”给予了好评;武汉大学文学院樊星教授充分肯定了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学术重要性,并对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中的南方意识和南方诗学特色进行了概括。

12月16日全天,谭五昌、朱寿桐、樊星、邹建军、路文彬、庄伟杰、蔡天新、陈卫、吴投文、赵金钟、张德明、向卫国、潇潇、世宾、陈永华、马新亚、庄森、任毅、赵目珍、黎保荣、史习斌、周显波、程继龙、李海燕、叶澜涛等与会人员围绕“批评家主体性建构”这一核心议题,从当前文学批评的弊端与困境、批评家主体性缺失的原因、主体性建构的途径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在批判中反思,在反思中建构。

一、对当下文学批评弊端的揭示

文学批评历史悠久,形态各异。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指引、提升及对文学研究的探路、奠基作用彰显无遗。时至今日,文学批评成了一门专门的职业,在新的文化背景和传媒环境下,产生了一些实际的问题,不仅为创作者诟病,也促使批评者进行

反思。

学院派批评历来以专业、深刻、严谨见长,但在当下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从学院派自身开始进行了反思。武汉大学樊星教授认为,现在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越来越弱,很多研究生和不少研究者总有一种理论情结,或者理论焦虑,拿出各种“主义”,然后把作品往里面套,这就脱离了和文本的接触,和鲜活人生的接触,使文学越来越成为理论的附庸。如何将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告诉读者,让他们体会到丰富复杂的人生,这一点很重要。比如顾城有一首诗叫《永别了,墓地》,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政治话语的顾城,还有一个以《英儿》为证想建立女儿国的顾城,所以至少有三个顾城。这跟教材将顾城说成童话诗人不一样。应该将这种智慧意识带入我们的文学批评,把人生的复杂性还原出来,不要仅仅依靠教科书的理论,按照某种理论的教条来阐释文学。这种对当下文学批评过度理论化、抽象化的批评引起了不少与会者的共鸣。湖南科技大学吴投文教授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表面上看非常“繁荣”,背后却存在一定程度的疲乏:话语上的花样翻新很多,真正有原创性的话语不多;很多批评看起来很理论化,但背后缺乏思想的支撑,是一种缺乏理论模式的套用;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文学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性被稀释,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岭南师范学院张德明教授从诗歌批评的细部出发进行反思,他认为当下的诗歌批评日益偏向于长篇大论,偏向于缺乏生命感悟和生命体验的学理阐发,以致陈腐的学究气、刻板的理论术语、僵硬而封闭的三段论模式充斥于诗歌批评界,新诗批评很长时间以来都无法及时地灵活地有效地进入当下诗歌现场,无法与诗人产生直接的交流与互动,无法把当下诗歌的现状准确地传递给读者,也无能从泥沙俱下的当代诗歌现场提炼出优秀的诗歌理论对读者进行陶冶和引导,这是今天的诗歌批评面临的严峻现实。

除过度理论化和过度抽象化之外,当下文学批评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语言与文化论坛》执行主编庄伟杰教授指出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困窘,集中体现在三种缺失。一是文学批评的判断失衡,二是文学批评标准的缺失,三是文学批评方法的模糊性。由于判断的失衡导致文学批评要素的不确定,进而对批评标准、模式构建(主体性构建)及方法论确立产生消极影响,使文学批评往往成为文学作品的附庸者。此外,从创作的介入到批评价值的自身构建皆缺乏引领性的主导,缺少理性分析和真诚批评,而批评群体在自身队伍的构建上,在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自身定位上,从大的方面说,是缺乏中国范式的思想主导;从小的方面看,是批评家的主体性严重缺失。肇庆学院黎保荣教授对现在的几种批评形态存在的弊端进行了综合分析,他认为学院批评存在过度阐释或是强制阐释,作协或官方批评行政色彩和宣传性比较强,作家批评往往以自身经验为主且流于故事情节的复述,包括媒体批评在内的公众批评缺点是“短平快”。岭南师范学院赵金钟教授则从具体的批评实践出发,指出当前文艺批评的症结:一是“红包批评”,以吹捧为主,丧失批评的良知和底线;二是“无心”批评,没有跟作品进行拥抱,直接拿理论来套,把批评当作理论的附庸。

创作与批评理应是相互促进的,然而当下的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常常产生裂隙。诗人潇潇对当下诗歌批评提出了一些质疑:第一,当下的诗歌批评大多是一种表扬,批评家大多是表扬家,少有人指出诗人创作中的欠缺,对诗人来说失去了通过批评反思和提升的机会;第二,诗歌批评过分学术化,批评文章大多引用西方文论的术语,喜欢吊书袋,把简

单问题复杂化,使读者如坠云中,也很难看到批评者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文章对诗人的写作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第三,现在批评家关注的大都是一些成名的作者,希望批评家多去发现那些有潜力的“黑马”;第四,批评界对女性诗人的批评总是喜欢从群体的角度去归纳,而不是从个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坚持个性化写作的女诗人关注不够。潇潇作为女性创作者的代表,其观点对文学批评的角色意识、自律意识和性别偏见具有警醒意义。

二、批评家主体性的缺失及原因探讨

文学批评一方面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文学现象等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批评家的思想、观点和表达更是不依附于其他而独立存在的。批评家在从事文学批评的过程中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性,主体性的缺失往往会使批评失去独立性,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与危机,与批评家主体性的缺失直接相关。

究竟什么是批评家的主体性,与会专家观点各异,又不乏共识。北京语言大学路文彬教授认为,主体有归属、服从的意义,主体的确立首先要服从自由,当自由失去的时候,服从就变成了反抗(回归),回归自由是主体的使命。但可惜的是,作家和批评家的主体一直在丧失,在反抗中寻找和回归主体成为重要命题。真正的反抗是打破表面和谐、追求深度和平,所以《平凡的世界》中的高加林从被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不是反抗,《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潘金莲作为现行状态的维护者也不是反抗。我们的批评界是一片和谐的声音,恰恰没有和平的声音,没有真实的自我的出现,如何改变这种状态是我们在批评主体性建构时需要深刻反思和努力做到的。广东文学院专业作家世宾认为,主体性建构中的主体就是指能够对客体进行认识和实践的人,对这个世界能否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在主体性建构中非常重要。所有的写作都是“我”对置身其中的对象的体验和认识。“我是谁?”是被出身、教育、社会关系所规范、塑造出来的。“我”是充满着可能性的,批评家要对身处其中的自我有一个认识。主体性的根本还是自由,要在反抗中不断丰富。闽南师范大学任毅副教授具体到诗歌这一门类,认为诗歌批评家的主体性应该是审美的主体性,就是把诗歌活动中的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确定诗歌批评内在的主体精神。

批评家的主体性是如何缺失的呢?吴投文教授认为当前的一些文学批评家逐步失去了对文学审美本质的把握,失去了文学标准和洞察力,也就渐渐丧失了批评的主体性。华中师范大学邹建军教授认为,批评家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他们具有的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文学批评主体性建构具有二重性,是主观与客观之间双向、多重、反复地相互吸收建构起来的。当前文坛甚至整个艺术领域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这么多年“抗日神剧”大行其道,胡编乱造;比如各大电视台宫廷戏盛行,充满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文学批评在这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批评家主体性的缺失,不敢讲真话,不敢讲直话。批评家主体性的缺失的责任并不完全在批评家和文学自身,而是由整个文化传统、整个评价体制以及文艺的整个运作机制共同造成的。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向卫国副教授通过追根溯源发现,古代从事文学批评的是哲学家、思想家,之后更多的是作家在“兼职”,现在成了职业化的工作,这跟20世纪以来的大学体制有关系。

当代的一些批评家天然地与体制结合,受诸多“条条”“框框”制约。从文学理论内部来看,接受美学提出批评家都是自由的,是有创造性的,像作家一样自由创造,从个体来看这有利于主体性的确立,但从现实来看,这种自由创造性又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批评标准没有了,共识消失了,这又消解了主体性。

三、倡导批评家主体性的自觉建构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认为,批评家的主体性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文学史意义和伦理意义,批评是创作与阅读之间的桥梁,在文学活动整个过程中不能缺席也不应该缺席;同时,文本解读、价值评判、发现被遮蔽的作家作品、对作家与诗人进行文学史定位都是批评家应尽的职责。当前不少批评家自信不够、主体意识不强,这种状况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得到有效改善。如何建构批评家的主体性是本次论坛的中心议题,也是与会代表关注的热点,大家从批评主体、批评方法、批评形态、批评文本与批评实践等方面多层展开,多维探讨。

文学批评者作为批评活动的实施主体,是建构批评家主体性的最关键要素,也是论坛争鸣最热烈的地方。邹建军教授提倡批评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观千把剑,写百篇文,这样才能建构起真正的主体性,才能逐渐成为成熟的批评家,成为批评大家。赵金钟教授认为要建立批评家的主体性,必须避免“红包批评”和“无心”批评,同时努力提高批评者的自身素养:一是知识素养,包括文学的专业知识,跟文学有关的外在的理论知识以及辅助知识;二是在知识素养之外的能力素养,包括艺术感受能力、艺术鉴赏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些素养,才能避免理论的钝化,才能用心拥抱作品,做“有心”的文学批评家。专业作家世宾认为主体性的建构有三个完成维度:一个是知识,要以富有良知的姿态置身知识的土壤,吸收营养,通过自由的心灵整合这些知识,让生命变得丰富;二是价值的选择,只有富有人文意义的价值,才能激活我们的知识,如果价值的选择是野蛮的,知识就成为野蛮的武器,成为野蛮的帮凶;三是体验力,有了知识和价值立场,还必须有穿越现实、穿越迷障的体验力,只有保持新的文化和文明的想象,才能全方位地提升我们的主体意识。向卫国副教授从文学观念的角度认为主体性重建必须注重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这对批评家来说十分重要;二是批评家文学观的确立,现在很多批评文章背后看不到支撑他的文学观念,表面看是理论化套用,深层次看是没有自己的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文学观念;三是语言观念的建立,很多批评者没有一个成熟的语言观,对语言本身的思考不够,也影响了主体性的建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赵目珍副教授认为,自由感与激荡性是批评家主体性建构的两个“占据”。当前的批评很多时候处在被动的地位,甚至显得比较无奈,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有逼迫感、焦虑感,自由度不如作家。批评家应该通过个人的批评意愿、对对象的喜好、对方法的运用以及批评与不批评的自由选择,获得批评的自由感。激荡性侧重于批评过程中,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心理激荡,与同行之间的学术共鸣,自己独到的发现和对他人的引领性。自由感是产生激荡性的基础,激荡在自由中实现,两者共同建构批评家的主体性。吴投文教授认为重建批评家的主体

性,批评家要坚守文学的本体立场,重新回到文学性上来;应该着重发现文学的内在意蕴,避免高度理论化的阐释;应该重新认识文本细读和文学感悟的重要性,批评时不是将作品还原为文学知识上的某个环节,而是要突显出其内部生机勃勃的生命状态;应该守持文学批评的底线,发现文学作品真正的文学价值和开创性,而不是无底线地为一部作品开道,或者随意贬低一部作品。福建师范大学陈卫教授认为,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批评者,在一个听众都很难“找”的时代,专业的批评如何吸引读者,把真正好的作品推介给大众,从而推动作家,推崇经典,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下批评家可做的事情,一是主动发现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问题,而不是仅仅对问题作出消极回应;二是回到批评之前,从源头了解创作,才能提高批评的敏锐性,同时自己要有创作的能力,才能在批评中理解作家的苦衷,而不是“打棍子”;第三,建设也是一种批评,比如这些年自己在新诗课堂引入旧体诗词,尝试诗歌翻译,进行诗歌朗诵,甚至请人吟唱,尝试诗与歌的结合等,把不同的声音带入诗歌批评,都是一种建设,是另一种形式的批评。云南昭通学院陈永华教授通过对近年来昭通学院主办的全国大学生“野草文学奖”的参与和观察,一直在思考获奖诗人到底优秀在哪里,那些获奖的校园诗人后续发展怎么样,诗歌批评在其中能做些什么。他很赞同文学批评要有温度、有人文情怀的观点,认为批评家应该关注当下,立足当下,在诗人成长、评奖方面,在发现、挖掘、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有所作为;广大爱好文学的大学生需要指导,也渴望指导,批评家在关注校园诗歌方面也要有所作为。任毅副教授认为当下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系统、金钱物质以及私人情感三大现实因素都影响到诗歌批评家的主体性精神与独立性,诗歌批评的主体性需要三大重建:作为诗学资源的继承主体,必须有一颗强大的“中国诗心”,以实现古今中外诗学资源的对话与“中国化”;作为诗歌批评实践主体,他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精神;作为诗学批评操作主体,批评家必须具有理性的深邃透视力与灵敏的诗歌文本感悟力。这三大重建关系着当下诗歌批评的整合发展与创新。

批评方法的选择及其科学性也是建构批评家主体性的重要内容。庄伟杰认为重建文艺批评主体性,就要探索新的审美体验的批评方法,注重批评的历史文化性,从“心”出发,提倡带有生命体验的文艺批评。张德明教授认为当下批评的困境与我们长期依赖和采用分析性、逻辑性的话语方式密切相关,而诗话批评在春秋笔法、人间情味、感悟思维和主体投入等方面具有优势,重启诗话传统对改写当下诗歌批评话语模式,促进诗歌批评的活力大有裨益。《文艺论坛》编辑马新亚认为,批评的有效性首先是“悟”,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熔铸到批评中,摆脱社会意识形态或学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的身份,放低姿态,摒除杂念,将“艺术经验”与“生命经验”相结合,用接近艺术本身的方式接近批评的真谛;同时,要确立整体性观念,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打通文史哲,将文学批评纳入文化批评的整体结构之中,确保文学批评标准的有效性。

采用何种批评形态,各种形态如何扬长避短,对建构批评家的主体性也很重要。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认为文学批评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学批评,另外一种就是文学家的批评写作,即文学家所从事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文学中除了创作本体,另外还有两种本体,一个是文学的学术本体,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本体就是批评本体。我们可

以把鲁迅的杂文看作是鲁迅的批评本体写作,当代作家在这方面投入的力量、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社会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批评介入,其中文学家的介入是很重要的,因为文学家最有可能脱离某种行业的立场和功利的考虑,从文明、历史、文化、审美等深入的非功利角度来对社会现象、文明现象进行批判。我们呼唤更多有责任、有思想的文艺家除了通过小说、诗歌这样的创作本体来反映我们的时代之外,还可以走鲁迅等人的路,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文学批评还有另外一种,即文学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审美认知、情感的拥抱甚至语言的实验。这是一种非常诗意的、非常感性的、非常有审美的穿透力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也是非常稀缺和可贵的。要重建批评家的主体性,就要重视文学的批评本体和学术本体中的审美批评写作。黎保荣教授认为当下有人提倡的学理性批评形态有利于弥补其他批评形态的弊端,并总结了学理性批评存在的三个维度:一是史,即批评的历史维度,包括史料翔实、历史视野、历史格局和历史限度;二是诗,即批评的审美维度,包括审美观念、审美分析、审美限度和审美超越;三是思,即批评的思想维度,包括思想性、问题意识和理性。岭南师范学院周显波副教授着眼于学院批评这一形态,指出当下的学院批评有优势,也存在弊端,要建构规范的学院批评,需要以文学史经典作为参照,以建构经典体系为目标,以公正筛选和客观评价同时代文学创作的经典性作为责任,以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原则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

重视文本在批评中的中心地位,同时注重批评文章文本自身的美感,也有利于批评家主体性的建构。岭南师范学院史习斌教授认为,当前的文学批评存在一定的浮躁之气,显得不接地气,导致创作与批评之间分庭抗礼、互不买账。解决途径之一便是重申文本中心,注重文本聚焦。具体来说:首先是进入文本,不能游离于文本之外,更不能故意跳过文本,甚至瞧不起文本,要做拥抱文本、与之交流的“有温度的批评”,不做“急性子批评”和“空手道批评”;途径之二:要深入文本,重视文本的核心地位,把握文本这一了解作家的“核心机密”,注重批评的文学性,基于对象,回到常识;途径之三:要超越文本,吸收诸多批评方法的合理之处,共同发掘文学的丰富内涵。这是一种“笨”功夫,吃力费时,也难以获得故作惊人之语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但它有利于消减当前批评实践中的浮躁之气,促进创作与批评的和平共处,避免批评的过度理论化,建设健康的文学批评生态。除了重视文本的批评,还要注重批评文本自身。樊星教授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尽可能地写成美文,有些作家如王蒙、韩少功、张承志的批评都很有文采,很有诗意,反而是有些批评家,谈着谈着就进入了高深的理论。在这方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都是值得反复体会的。怎样才能像谈家常话一样把文学的智慧表达出来,都是我们追求文学批评的文学性时应该具备的眼光。岭南师范学院程继龙副教授认为当下诗歌批评陷入了危机,只有抓住批评文体、增强文体意识、写出成熟的批评文章,才能应对危机中的种种问题。如何把握和完善批评文体呢?一是要有详实的史料支撑,不尚空谈,言必有据;二是要能上升到诗学思辨的高度,透过个案、现象解决有价值的诗学问题,描述与评判要有诗歌史、诗学史的参照;三是要有文章之美,要把批评文章当成艺术品来细细地雕琢打磨。只有这样,批评才能“文质彬彬”,才能传之久远,才能与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想和历史对话。

除了对批评家的主体性建构问题进行直接阐述,还有与会专家从微观的角度从事具体的批评实践。浙江大学蔡天新教授把关注点投向诗歌的相似性原则与拼贴艺术,他认为诗歌隐喻与相似性相关,不同年龄、思想、学科背景的交流碰撞可以加强这种相似性;拼贴是20世纪艺术的重要特征,是隐喻的一种手段,在诗歌中,包括画面与意义的转换、画面与画面的转换、画面与抽象意义的转换、抽象事物与抽象事物之间的转换。广东海洋大学李海燕教授阐述了打工诗歌中的认同危机与主体性建构,她认为“农民工诗人”的身份导致农民工的身份危机、打工诗人的身份危机、打工诗人被“收编”后的身份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打工诗人通过创作呈现了自身漂泊无依的生存状态,对城乡身份差异发出强烈质疑,很多时候他们超越了自我身份意识,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现代工业化社会,揭示人们日益被扭曲与异化的灵魂。打工作家们对“农民工”们被歧视、受排挤的边缘地位有着惨痛而清醒的认识,他们既对不平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愤怒的指责,又深入反思了农民工们人性的异化与主体意识的缺失,并试图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重构打工者的身份认同。广东海洋大学叶澜涛副教授着重分析了新诗的形式探讨对新诗创作的引导性,他认为1990年代以来新诗发展与新诗的形式研究都显示出滞后的状态。新诗的形式研究涉及分行、标点符号、人称代词、虚词、节奏、对称等多个问题,在诸多形式研究中节奏问题最为重要。新诗的节奏问题与古典诗词中的“韵”不是同一个概念,比“韵”的概念大,涉及多个形式问题。新诗发展到当下,需要开始建构新诗的节奏观,这对新诗的创作具有正面的引导性。这些具体的批评与研究具有学术性,有问题意识,从操作层面体现了批评的主体性。

在闭幕式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主要发起人谭五昌对本届论坛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短短一天时间内,论坛安排了4场主题发言和1场自由发言与交流互动,各位与会代表从不同的视角对论坛主题进行了到位阐释,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见解深刻,表现出了批评者应有的思想立场和独立人格,也体现了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一直秉承的新锐、高端、包容、建设的总体精神,堪称一届非常成功的学术论坛。

(史习斌,男,1979年出生,湖北建始人,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写作学)